



《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法治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旻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西子智慧产业园内,一场《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网络直播宣讲活动正火热举行,活动以“律师+执法人+税务员”的模式,围绕《条例》的出台开展解读和宣讲。

3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是全国第一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实施两个月来,伴随着浙江司法行政部门的“法雨春风”,宣讲会、网络直播、解读手册等多元化的方式,使得《条例》的“发展春风”吹向浙江大地各个角落。

建立数字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

2020年,以数字经济为“一号工程”的浙江提交了一份高分答卷:全省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强劲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突破7000亿元大关,达到7019.9亿元,增速从一季度的1.8%,上半年的9.4%,前三季度11%攀升到全年的13%,高出GDP增速9.4个百分点,成为对冲疫情、平抑风险的经济“压舱石”,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和战略作用显著提升。

而要巩固和发挥好数字经济这一显著优势,就必须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重点难点问题,以法治手段引领和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尹林回忆《条例》的出台过程依然觉得振奋人心:“草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省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7月、11月、12月分别召开

会议进行审议。其间还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广泛征求省有关部门、市县、企业、行业协会、省人大代表等各方面意见,召开相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数字经济专家、法律专家等各层面座谈会,论证会30多次,每次讨论现场都非常热烈。”

《条例》在总则第二条给“数字经济”下了定义: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定义来源主要是依据2016年G20杭州峰会制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表述。

同时,为创新规范数字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条例》规定要加强对数字经济的领导,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并将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指标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体系。

杭州西子智慧产业园,一直被称为“用智慧成就梦想的地方”。在创业热土上奔驰的“黑马”企业家代表听完《条例》的宣讲感慨道:“《条例》的颁布对我们园区企业的发展是重大利好。原先我们也想把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是由于基础支撑薄弱不敢转,不会转。现在《条例》里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产业园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支撑,这对我们企业是非常大的鼓励。”

数字化产业化双向共同发展

当前,摆在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面前的两道考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之下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数字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规模体量不够大,创新能力不够高,创新平台引领作用不够强,又如传统企业数字化转

型速度不够快、质量不够高,基础支撑薄弱以及中小企业不愿、不敢、不会转型。针对这些现状,《条例》将数字化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单独成两章,多层次、多举措推动双向共同发展。

为了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条例》规定了要培育多层次、递进式的数字产业企业梯队,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共生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创建数字经济领域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等线上线下创新创业平台。鼓励提供数字化产业化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推动数字产业发展。

而对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方式,《条例》明确通过服务指导、试点示范、政策支持等方式支持工业互联网普及应用,推动企业发展智能型制造。

去年年底的浙江省首届“未来工厂”发布会上发布了首批12家“未来工厂”,还同步公布了16家“未来工厂”培育企业。《条例》实施两个月来,宁波作为全国首个“制造强国”试点示范城市,企业开建“未来工厂”的热情高涨。

作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又是全省首批28家“未来工厂”之一,康赛妮最近又与德国西门子联手打造了全行业首家智能“黑灯”数字化无人工厂。项目现场负责人牟黄波介绍说,新厂房共有五层,羊绒从一楼投料口投进机器,全程自动化操作,最后在二楼制成纱线。未来康赛妮安排客户订单,只需在中控中心下单,智能工厂就能自动完成从投料到出厂成品打包的全过程操作和质量控制,预计该工厂投产后,生产效率将提升20%,库存周转率提升100%,交货周期缩短50%,总用工计划人数减少50%。

全面提升治理数字化水平

相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的内涵更丰富,涉及面更广阔。《条例》明确了治理数字化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等领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治理机制、方式和手段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打造“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这是浙江整体智治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注册用户突破5500万,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

在《条例》中,记者可以看到数字社会建设有关方案,如推动“城市大脑”应用推广,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交通、平安建设、医疗健康、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的综合应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广电子凭证、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电子票据的应用,实行医疗检验、检查信息共享,拓展医疗保障数字化平台便民应用。

这些方案有不少已经在杭州实现,当前,杭州正全力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数字治理已经深入到杭州整个社会治理方方面面。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到智慧化,杭州城市大脑正在快速“进化”。

数字化浪潮来袭,以老年人为代表的群体却面对越来越少的售票窗口傻眼,面对安检要求出示“健康码”却找不到而慌乱,面对站在路边招手等不到一辆“空车”而急迫……这一人群由于数字素养,技能跟不上,逐渐暴露出深层次的“数字鸿沟”问题。

对此,《条例》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优化传统服务与创新数字服务并行的原则,制定和完善老年人等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群体在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措施,保障和改善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群体的基本服务需求和体验。

此外,针对数字素养水平不均问题,《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数字素养、法规、规章以及技术、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一颗颗发红透亮的樱桃挂满枝头,一张张充满希望的笑脸映红了樱桃林……4月28日,站在河南省新安县磁涧镇礼河村樱桃沟入口处,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卫星感慨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这个昔日贫困村有个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张三!他当选省人大代表后,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联系广的优势,邀请农业系统的代表到村里帮助寻找致富项目,最终确定种植大粒樱桃,2018年全村实现整体脱贫。”

礼河村地处丘陵地带,因受地理条件限制,2012年被列为省级贫困村,目前樱桃种植面积已超过30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樱桃村,富裕村。张三兴奋地说:“今年全村樱桃种植收入预计能突破2300万元!”

礼河村的成功,带动更多的村子走上了乡村振兴转型发展的道路。仓头镇张村党支部书记郭天福说:“我们村干部经常和张三代表交流互动,我们村结合村情开始连片栽种草莓、樱桃、桃、梨、红薯等,并修建高标准粮田,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万元。”

看着贫困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新安县带队调研基层人大代表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高欣说:“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与群众联系广,在群众中有威信,切实发挥他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带头作用,对于全面激活乡村振兴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产业发展推动者

4月28日下午,48岁的礼河村村民刘爱群正在自家樱桃地摘樱桃。她乐呵呵地说:“从4月25日开始到5月底,家里五六亩地的樱桃进入采摘期,收樱桃、卖樱桃,是俺一家人最忙碌的日子,却也是最有收获的日子。”

在她看来,张三作为人大代表,总能解决群众遇到的难题,种植什么样的品种,他能请来农科院的专家,销售遇到难题,他能请来外地客商前来收购,自从开始种植樱桃,她家从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盖了新房子,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前些年村干部号召种樱桃,有些人不敢种,怕赔。张三说,我种的比你们面积大,要赔,我的损失比你们都大。”72岁的高文俊说,外地有不少村民看礼河村靠种植樱桃脱贫了,就找张三请教种植技术,他就派有种植经验的村民去帮扶。

像张三这样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已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李卫星说,正在兴建的天兴生态园项目占地5500亩,涉及礼河、掌礼、柴湾、龙渠4个村,计划投资26亿元,是以种植大粒樱桃为主导的一二三产相融合的综合园区。该园区采用绿色种植技术,定期增施羊粪、饼肥、菌肥,采用农业、物理、生物、人工综合防治病虫害措施,浇深井水,实施富硒生产技术,樱桃、石榴、葡萄三大水果获国家绿色认证,达到富硒标准,年产富硒水果100万公斤以上,三产服务年接待休闲观光游客10万余人次,年产值3000万元,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园区。

新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亭亭说,该园区采取多种形式带动扶贫,实现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探索者

“河边吃水却靠天,临街赶集走半天。姑娘不嫁本村汉,光棍撒汉满山转”的顺口溜,让20年前的栾川县潭头镇拔云岭村民难以释怀。拔云岭村三面环山,坡陡水急,那时,村民出门没有桥,也没有路。1999年,杨来法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决定带领乡亲们迈开摆脱贫困的第一步——修路架桥。他们背着干粮,扛着锤子、铁钎在陡峭的石山上埋头苦干,一天、两天、……手磨出了血泡,脚被石头砸伤,大家无怨无悔,因为心里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再让子孙后代世代穷下去,让人瞧不起。

如今,村里架起了桥,修通了路,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着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特色乡村旅游,形成“林木山间绕,林间蜜蜂飞,林下牡丹开,土鸡花间养”的立体种植、养殖循环产业模式,村里提前实现整村脱贫,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河南省传统村落、洛阳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栾川县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称号,2018年1月,杨来法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富裕起来的村民更渴望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杨来法说,有的村民因邻里纠纷打架斗殴,最后伤了和气,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十里八乡的村民遇到烦心事总爱找他说。

在村务管理上,杨来法实行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理财,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落实好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他带头参与人民调解、群防群治工作,通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把问题化解在基层,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积极推进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杨代表说话在理,处理事情公道,大伙儿都愿意听,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高。”2018年5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曲海滨在乡镇调研诉源治理工作时,不少人向他讲述杨来法的调解故事。“如果依托杨来法的全国人大代表威望,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化解体系,积极参与诉源治理,更方便,更快捷地化解群众纠纷,就能不断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他和杨来法面对面交流后,决定在潭头镇人民法庭组建“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

2018年6月21日,“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正式组建,至今已化解纠纷31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0%,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和谐。

乡风文明建设倡导者

走进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映入眼帘的是白墙黛瓦的民居,墙面上绘有图文并茂的忠孝故事,法治常识,街面上干净整洁,路旁五颜六色的小花散发着清香。

2012年,温天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决定以发展全域旅游为抓手,依托境内景区资源优势,量身打造一个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婚纱摄影、风景写生、温泉养生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温天序当选洛阳市人大代表后,多次呼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加快乡风文明建设,他带领党员和村民代表到外地参观考察,深入推动移风易俗,统一管理村里卫生,提高发展乡村旅游的内涵。

如今,村里建设了“文化墙”,设立了“好人榜”,制定了村规民约,对外来游客热情友好,诚信经营,让文明新风融入村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出美好乡村乡风文明新风尚。

村民高兴地说:“自从俺们村支书当选人大代表后,眼界更宽,见识更广,还带动周边村庄一起发展乡村旅游,大伙儿越来越有品味了。”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胡东利说,基层人大代表在思想素质、个人品质、眼界见识方面的优势,是村民公认的“能人”,能够培育引导村民在思想观念、社会认知上得到提升,以此来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加快构建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

以立法促进制度集成创新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在全国率先出台河长制湖长制法规,在全国率先推行五项商事登记管理创新性制度,推出全国首个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法规,制定全国首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法规……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是重中之重。近年来,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着眼于加快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在全力配合国家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调整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运用特区立法权和省级地方立法权加快地方立法,以立法促进制度集成创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有力扛起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责任担当。

促进重点园区管理制度创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位于琼海市万泉河两岸,是我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园区。

2020年6月16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条例》,以立法促进先行区高水平改革开放,释放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

海南重点园区承载着先行先试自贸港政策的重要任务,是自贸港建设的先行试验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于2019年制定了重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进一步创新行政审批制度。该条例通过以规划代替立项审批,以区域评估代替单个项目评估等办法,最大限度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程序和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2019年、2020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分批分期作出决定批准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口江东新区等9个重点园区推广适用特别极简审批。2020年,作出关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在部分重点园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赋予重点园区更大自主权。积极推动制定自贸港重点园区单行条例。这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实施,有力促进海南重点园区管理制度创新,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为自贸港政策和项目加快落地、重点园区高水平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推进商事及服务开放制度创新

商事主体的蓬勃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才充满生机和活力。

早在2018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便制定了商事登记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推行五项创新性制度,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行业创造力。

该条例在全国率先推行商事登记“全岛通办”和“全网通办”,改变传统分级属地登记模式,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商事主体的登记机关进行统一登记,申请人通过电子化登记平台自主申报,登记平台自动审核商事登记申请信息,实现登记注册“办事不求人”和“一次都不用跑”。

根据条例规定,简化注销公告程序。公告时间由45日压缩至7日,公告方式由报纸公告改为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更加便利商事主体快速退出市场,积极回应关于企业“退出难”的社会关切。

此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还先后对注册会计师条例和律师条例进行修订,扩大会计师和律师行业对外开放,创新会计师和律师服务机构组织形式,放宽市场准入,畅通人才引进,有效破除制约涉外会计和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

推动生态保护制度创新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打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战略定位。

2018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出台河长制湖长制法规,分级分类明确职责,实现河长湖长履职及管理有法可依;制定湿地保护条例,以最严格的标准加强湿地管理;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作出比上位法更为严格的管理规定;修订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促进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019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全国首个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法规,在制度规定上从“限塑”向“禁塑”升级,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和塑料餐具,制定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提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提供法律依据。

《海南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于2019年12月31日通过,首次以立法形式将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整合衔接。同时,修改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理顺海岸带保护利用综合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等专项规划的关系,为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海岸带发挥更加有力的法规引领作用。

2020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分区管理制度,对经营性项目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既守护好绿水青山,又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创新。

促进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2020年6月16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于2020年8月1日起实施。这是一部符合海南省情,体现矛盾纠纷化解规律、具有海南特色的化解纠纷法规。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近年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多部法规,以立法有力引领,推动了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首次明确社会保障卡整合替代各类民生服务卡和证件,首次明确社会保障卡立足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一卡通用……”2019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全国首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法规,创新社会保障卡管理制度,具有多项全国首创的制度创新。

2020年4月1日起,《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按照“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走私货物物品监管机制,突出对减免税进口货物物品的管控,加强对走私行为的查缉,建立符合自贸港建设的反走私体系,为海南构建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的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法治保障。

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施行。这是海南首部全岛适用的自贸港法规,开创自贸港专项消防立法先河。条例适应自由贸易港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新要求,推动消防法治和体制机制深层次变革,实现消防制度集成创新,是消防安全和自由贸易港融合发展的最新实践。

制图: 李晓军

